

主編 李天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心理學（第二輯）

Modern Psychologies and Education

現代心理學與教育

〔美〕雷斯德（C. E. Ragsdale）著 鍾魯齋 張俊珩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心理学（第二辑）

Modern Psychologies and Education

现代心理学与教育

[美] 雷斯德 (C. E. Ragsdale) 著 钟鲁斋 张俊珩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心理学与教育/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心理学)

ISBN 978-7-5520-1771-7

I. ①现… II. ①李… III. ①教育心理学 IV. ①G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052号

现代心理学与教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 9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1.2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71-7/G.628

定价: 104.00 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棒，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来，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美] 雷斯德 (C. E. Ragsdale) 著 鐘魯齋 張俊珩 譯

現代心理學與教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我重視科學的研究，我更重視科學的應用。我自信是一實用主義者，認定一切活動，若無科學的根據，必不免因受主觀的見解或常識的判斷的影響，而減損其真實的價值；一切學問，若不求其實用，則如珍寶深藏，就無多大的意義。我們欲求教育之能表現其效能，除看重社會的需要外，必須以心理事實為根據。這是現代教育學家所公認的。可是在實際上，一般教育書籍，屬於主觀見解或常識判斷的陳述者居多，而大都是缺乏心理的基礎。再者，我們從事教育的人去研究心理學，其目的原是為了實用；但一般心理書籍，又大都屬於純粹心理事實的討論，而很少以教育的材料為引證。這兩種情形，均是不甚合理而應設法糾正的。

最近，雷斯德教授著述現代心理學與教育一書，頗能打破上面所述那種錯誤，誠可謂特豎心理與教育的出版界的新幟。他應用教育的材料，來討論心理的問題；同時，亦根據心理的事實，來研究教育的活動。以教育的立場言，他的立論甚有科學的根據；以心理的立場言，他的研究甚有實用的價值。讀其書，可以雙美兼收，一舉兩得；正如西諒所云，有「投一石而獲兩鳥」的功用。今鍾魯齊先生與張俊珩同學把此書譯為中文，譯筆忠實而且暢達，其有貢獻於國內教育界實甚巨，故甚樂為之序。

杜佐周序於廈門大學，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日。

譯者序言

我們翻譯這本書，其動機有二：第一記得從前開始讀心理學的時候，覺得心理學真是莫明其妙的學問；不特理論極其抽象，即各著作家所持的觀點，也各是其是而非其所非。往往看完一本書，對於該書著作人的立場，究盡屬於那一派，仍不甚明瞭。後來讀過近代心理學派別一類的書，然後對於心理學的派別較能認識，而研究心理學的興趣遂陡然增加。近年來關於比較心理學的專著，雖數見不鮮，然雷斯德（C. E. Ruggles）著的現代心理與教育（*Moder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一書，可算其能獨出心裁，將各派心理學的起源、演進及其書同相異之點，闡發殆盡，誠足為研究現代各派心理學者開一新的途徑。本書之譯，或足以應吾國有志研究心理學者的急需。第二，教育心理學是由心理學演進而來，將心理學研究所得的原理原則應用於教育，是為教育心理學。近十餘年來，關於教育心理學的書籍，正如雨後春筍日見蓬勃；著作家如桑戴克（Thorndike）、格特可（Gates）、桑德福（Sandford）、斯達奇（Starch）、品特拿（Pinter）、吉特（Judd）等在教育心理學界尤有特殊的貢獻。然而他們的著述，或為普通教育心理學，用自己心理學的立場去發揮；或為科目的心理學，如數學心理或中學各科心理等，僅足以供教學各科目之用。我們很少看見用各派心理學的立場去討論教育的重要問題者，本書是創作。在第二篇，雷教授則用各派心理學的眼光去討論重要的教育問題，不特可作比較心理學看，同時又是比較

然而與心理學界自難免發生了許多不協調和互相衝突的現象。這派對於人類本性的觀念，每為他派所反對，結果遂使一般普通人甚至有些心理學界的同業，對於心理的事實和解釋，未免茫然無所適從。普通的研究，都是聚集於各派心理學的信徒中，注意於「是其所是」的爭論。

現在若有人與其同事或朋友討論某心理學的問題，他是屬於構造派、機能派、行為派、目的派、弗洛特信徒（Freudian）、扼勒信徒（Allerian）、容格信徒（Jungian）、完形派信徒（Gestaltian）、抑或屬於其他各派，就會被人知道了。若有人在任何會場中宣讀心理學論文，表示他屬於某一派，即時就可引起聽衆關於其他各派者作爭執或辯護的反響。作者在教員、普通人、或心理學家等團體中，無時不看見其中有些分子作辯護的態度。所謂者無論是屬於何派，都是努力去解釋人類的機構。在作者的大學裏邊，已經有了六派著名的心理學。各派都有學生們去信從；一派的信徒，對於其餘各派的主義，表示着不大信用。

各派心理學的不同點，及其對於人類天性觀點的差異，如能一一指出，實為讀者所需要而且是所希望的本書是雷斯德教授為着討論這問題而作。始則將每派心理學的要點作簡略的敘述，並指示各派在現代心理學中發達的經過；次則指出各派的學說，有何同異之點。他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建設一教育程序，或在課室內教學，或指導那般對於某種信念或行為覺得無所適從或贊成或反對的人，各派心理學在步驟的根本原則上，能够表示同意的，究竟能達到何種程度？雖然各派心理學對於人類特性和某種活動的來源和根據，抱着不同或相反的見解。

他指示着當實在處理人類而求成就所需要的結果時，各派中總有相當的一致性讀完本書以後，就知當教授對於現代心理學的爭點，開發殆盡；而其衝突大部分是在於他們對於心理活動方法上的根本觀念，而不在于用以指導各個人，尤其是幼年人的行為，以期獲得某種結果所用的方法。

當教授將每個著名心理學派的態度見解和觀念，不偏不倚的相盤托出，讀者將以為他是接近客觀派或行為派，但是他任在本書裏敘述並估量各派心理學並不為他自己的見解所拘束。即以編者來說，覺得其與機能派和生物派比較接近而滿意，因為他相信個人受遺傳的影響較人而與行為派不同，但同時自己又承認是屬行為派或客觀派在這裏說出這話，目的在使讀者知道如果要找出最清楚最滿意的人性概念，斷不能偏於一方如機能派、機能派、弗洛特信徒、客觀派完形派或目的派，當一人有了派別的立場，則帶成銳者所見皆然，就不能接受其他各派的長處了。本書的著者，似較接近於客觀派，然不失其為一折衷的心理學家（*Collected Lectures*）；本書的討論，有事實可以證明的就是著者編者與大多數的讀者，都不能絕對的分人為某一派的心理學家而堅守不移，編者相信這現代心理學與教育一書，除其他貢獻外，尚可為各派心理學溝通的橋樑過去十年或十餘年間，各派中所存在的融洽，必因之而大有增進。

當教授編著此書的目的，部分固然在於顯示各派心理學的觀點與態度，但根本是指示教育的程序，如何受每一派（分而言之）和各派（合而言之）心理學的原則的影響本書的後半部，是用各派心理學的觀點去

教育心理學。將心理學、教育、教育心理學溝通一氣，使研究教育學或教育心理學者都會得各種重要的知識，又可以供應一般教育人士的需要。以其編制新穎，用途廣闊，所以毅然決然努力將本書譯出，以餉國人。

除上面所說者外，仍有下列幾個特點：（一）敘述詳明扼要。其所討論的問題，是由許多讀教育學和心理學的學生對雷教授所提出者（見本書編者序言），非單由著者一人的意見設計編成者可比。（二）組織完善。其編制的方法，是演繹和歸納並用。每章每段首有引言或標題，提起全章或全段的意思，每章之末歸納為一章總述，本書之最後一章，則歸納為全書的概要。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使閱者不多費腦力而容易明瞭。（三）態度公正，凡做比較工作者最怕是用偏見將自己派別所屬者則是之，而對他派則非之，所謂「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本書的著者，力避此弊，他自己雖接近客觀派的心理學，然對其他各派仍用公正的態度去論述，一切都任讀者去判斷，尤不失學者的本色。其他的特點，可參看本書的著者和編者序言，茲不多述。

譯者極力尊重著作者的意見，譯文以求真為主。譯完後，彼此互相校對一二次，復蒙廈大教育學院院長孫啟深先生、教授杜佐周、李相昂、吳家鎮諸先生及鄭鵬翔同學校園一次，感激之餘，順筆誌謝。

鍾魯齋

張俊珩

序於廈大教育學院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編者序言

凡讀此書者或都以為過去二十年中，心理學已有長足的進步。經各專家的努力，使心理學為易解的，一致的，衆說紛紜，從茲興起。教員們、社會工作者、以及各專業的人們和普通人士，莫不以心理學為最好的談話資料；如果有人赴美國任何地方的教育會，必能聽到許多演講家討論心理學的原則及其應用於教育的步驟。若有人去聽客堂裏邊的談話，也一定會看見到許多客人稱讚或反對此派或那派心理學。醫生介紹心理學加入為醫學專門學校的功課；律師詢求讀心理學的書籍，使他們能按照人性的定律執行他們的專業；父母找尋心理學書的目標，加以研究，使能明瞭他們的兒童，以便因材施教；社會工作的人們，要學習心理學的最近發現及其進步。大家既對於心理學有這般的熱誠與活動，正希望這時有許多心理學的原則，可為普遍的承認與採用；但這個希望，或者還是未曾實現。

四五十年前讀人類本性的學生，都贊同許多所謂心理定律，因為他們所從事的心理系統，及其所研究的工作，立場同而方法亦同（內省法）。但因科學研究的發達，客觀研究法已為廣博的採用，人們對於用內省法去探討人類心理的本性與功用，在準確和適當方面，就開始失了信用；對於內省心理學家的探求與工作，就表示不滿；即心理的組織及其動作形式，一時大家曾表示同意者，也就開始瓦解。因內省心理學的崩潰，而各派心理學遂勃

然而與心理學界自難免發生了許多不協調和互相衝突的現象。這派對於人類本性的觀念，每爲他派所反對，結果遂使一般普通人甚至有些心理學界的同輩，對於心理的事實和解釋，未免茫然無所適從。普通的研究，都是聚集於各派心理學的信徒中，注意於「是其所是」的爭論。

現在若有人與其同事或朋友討論某心理學的問題，他是屬於構造派、機能派、行爲派、目的派、弗洛特信徒（Freudian）、扼都勒信徒（Adlerian）、容格信徒（Jungian）、完形派信徒（Gestaltian）、抑或屬於其他各派，就會被人知道了。若有人在任何會場中宣讀心理學論文，表示他屬於某一派，即時就可引起聽衆屬於其他各派者作爭競或辯護的反響。作者在教員、普通人、或心理學家等團體中，無時不看見其中有些分子作辯護的態度。演講者無論是屬於何派，都是努力去解釋人類的機構。在作者的大學裏邊，已經有了六派著名的心理學。各派都有學生們去信從；一派的信徒，對於其餘各派的主義，表示着不大信用。

各派心理學的不同點，及其對於人類天性觀點的差異，如能一一指出，實爲讀者所需要而且是所希望的。本書是雷斯德教授爲着討論這問題而作。始則將每派心理學的要點作簡略的敘述，並指示各派在現代心理學中發達的經過；次則指出各派的事實，有何同異之點。他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建設一教育程序，或在課室內教學，或指導那般對於某種信念或行爲覺得無所適從或贊成或反對的人，各派心理學在步驟的根本原則上，能够表示同意的，究竟能達到何種程度？雖然各派心理學對於人類特性和某種活動的來源和根據，抱着不同或相反的見解。